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王国维与人间词话

祖保泉 张晓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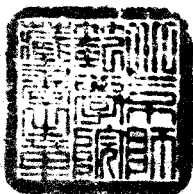
王国维与人间词话

祖保泉 张晓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6220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96220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王国维与人间词话

祖保泉 张晓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辞书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69,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4000

ISBN 7-5325-0678-9

1.40元 定价：1.50元

DC 54/03

目 次

一、王国维的生平和思想	1
二、《人间词话》的理论和批评	38
(一)《人间词话》的理论	40
甲、境界说	40
(1) 王国维与境界说	40
(2) 境界是什么	43
(3) 境界为诗词之本	50
(4) 何以谓之有境界	53
(5) 境界的范畴	56
(6) 境界的实现	77
乙、文学散论	79
(1) 文学与游戏	79
(2) 文学家与政治家	83
(3) 内美与修能	87
(4) 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92
(5) 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	94
(6) 忠实与游词	97
(7) 隔与不隔	99
(8) 诗与词	101
(9) 文学的发展	103

(二) 《人间词话》的批评·····	106
评唐五代词·····	108
评北宋词·····	115
评南宋词·····	121
评明清词·····	127
三、《人间词话》的特点及其影响·····	131

一、王国维的生平和思想

王国维，初名国祯，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又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清光绪三年(1877)生，民国十六年(1927)卒，终年五十一岁。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著述宏富，在史学、经学、小学、甲骨学、金石学、历史地理和文学理论批评诸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诗词创作是他早年的爱好，虽然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在同时代的旧体诗词作家中，确实可以视为大家。

王国维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二十一岁之前(1877—1897)他在家乡学习，接受封建传统教育；二十二至三十四岁(1898—1910)他外出谋生，治学道路几经转折；三十五岁至去世(1911—1927)，是他治学道路既定，学术精进时期。以下便按这三个时期，简略介绍他的生平和思想。

(1) 1877—1897年

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城内双仁巷的一个中产之家^①。他的父亲乃誉公(号蕤斋)是个始而为学、继而经商、又曾游宦的人物。乃誉公曾在经商游宦之暇,收集些书画篆刻之类以为玩赏;也能作诗词、古文,著有《诗馀庐诗集》二卷、《游月集》十卷。王国维的母亲凌氏是邑绅的女儿,在王国维四岁时,她就病故了,因此,年幼的王国维只好依靠姑祖母和叔祖母抚养。少小失去母爱,这对王氏忧郁性格的形成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年后,乃誉公续娶叶氏。在王国维十一岁那年,他有了个小弟弟,取名国华。两兄弟因为年岁相差太多,不能伴游,王国维时常快快独处,无以为乐,成了个身体瘦弱、沉静寡言的少年。早年的家庭环境,对他终生的悲观思想,都是有影响的。

王氏七岁入塾,从十一岁起,塾师开始教他骈文、散文和古今体诗。他在《自序》中说:“家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之书,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可见他少年时学习环境不差,自己也勤奋求知,他的旧学可以说在童年就开始扎下了根基。

^①王氏三十五岁时,作《自序》曰:“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见《王国维遗书》(以下简称《遗书》)第五册。

十六岁时，王国维参加岁试，以第二十一名入“州学”（即考中秀才）。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在此，《自序》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对历史的喜爱使王国维获益非浅，以后他在研究一切学问的时候都能用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历史的眼光，从而得出非同一般的深刻的结论。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年王国维十八岁。战争带给这个青年的震动是：“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①在此之前，王国维一直在传统旧学的封闭系统中打转，如今得知天外还有天，这对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来说，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可是他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很好，一年的收入，只能满足衣食之需，没有余钱供他外出学习，因此王国维整天闷闷不乐，但也无可奈何。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活道路极其狭窄，除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外，似乎别无他途。王国维和千千万万的学子一样，这条道路也早已被规定了，然而他对科名并无兴趣。他二十岁结婚（妻莫氏），二十一岁开始当塾师，就在这年秋天，他到杭

^①《自序》，见《遗书》第五册。

州去应乡试(考举人)，“不终场而归”^①，自此下决心弃绝科举。这一决心宣告了他对那条传统的人生道路的反叛，预示着一个新的未来。

(2) 1898—1910年

一八九八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终于离开了他的故乡，来到上海。

这年，正值戊戌维新；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曾先后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由于守旧派的参劾，强学会遭到查封，于是他们便以所余会款重新组建了《时务报》报馆，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为经理，报馆设在上海，王国维初至上海时，便是在这家报馆里担任书记和校对工作。

与《时务报》创刊同一年，罗振玉也在上海创办了农学会，翻译各国的农学书报，后来因为缺乏翻译人员，便出资兴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人为教授，设置日语、英语及数理化等课程。罗振玉当时也是一个醉心于“新学”的爱国人士，他在《集蓼编》中说：“时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②

^①据王国维童年密友陈守谦的祭文：“……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闹，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24页。 ^②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27页。

王国维经报馆主人的同意，每天午后至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因为报馆事务繁杂，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王国维的学习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们。月末考试，他在不及格之列，按规定应退学，罗振玉以其“笃学力行”，向教授说好话，才得以留下继续学习。这年夏天，他又因病回乡，休养了几个月。等他病愈之后回到上海，《时务报》已经停刊，报馆也关闭了。就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罗振玉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让他到东文学社料理庶务，半工半读，免收学费。罗振玉之所以对王国维特别关照，是因为他曾经在王氏同舍学生的扇面上见过王的诗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氏对此十分欣赏，认为王国维是“伟器”，不应被埋没。）

这是罗、王之间友谊的开始，也是王国维一生学业的发端。

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了两年半，当时学社中的教师是两位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有一天，王国维偶然在田冈的文集中发现了有关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引文，心羨不已，然而由于文字不通，未能读其原著。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变发生，东文学社解散，王国维回到家乡，仍坚持自学英语。第二年秋天，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去日本留学。他的老师藤田劝他专修理科，

于是到日本后，他白天学英语，晚上去物理学校学数学，在东京待了四五个个月，因病回国。他的学校教育自此结束，此后便是“独学之时代”^①了。在这三、四年中，王国维所接受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外国语（日语、英语）的知识与训练，这对他以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帮助极大；严格的思维训练和丰富的外语知识使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远远超出了他的前辈学者，他在学术上能取得那样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这种方法论上的先进性与自觉性当然是分不开的。

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起先在上海南洋公学附设的东文学堂当执事（罗振玉为该校监督，藤田为总教习），同时帮助罗振玉编译《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王氏先后执教于通州（江苏南通）师范学校、苏州师范学堂，讲授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同时研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著作。

王国维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喜欢苦思冥想。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②。所谓“人生之问题”，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这类问题，一般人是不会去想它的。

①②*自序》，见《遗书》第五册。

我国人最重实际，像这种没有实际用途，徒增自己烦恼的问题，更少有人去问津。而王国维却时常为这一问题而苦恼，于是他决定从事哲学研究——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确立治学的方向和目标。此时他读书的指导者仍然是他的老师藤田丰八，在藤田的指导下，他读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如“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①等，然后才开始读康德的著作。

康德的书很难懂，王国维初读《纯粹理性批判》时，“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②，于是他放下康德，转而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是一个文学型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通俗易懂，文字优美，可读性很强，加上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与王国维自幼养成的忧郁性格十分合拍，因此王国维如获至宝，一年之中便把这本厚厚的著作读了两遍，并且找来了叔本华的其他著作如《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奋力研读。王国维称“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③，并且以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对康德哲学的批评“为通汗德（即康德）哲学关键”。^④

①②③④《自序》，见《遗书》第五册。

王国维研究康德哲学，前后经历了五年，自从以叔本华为中介而读懂康德之后，他又攻读了康德的伦理学和美学著作。在第四次的研究中，他感到窒碍已经很少，而且觉得“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①。与此同时，他对其他西方思想家如洛克、休谟等的著作也时常涉猎，这对他全面深入地理解康德哲学自然是有利的。

王国维对康德评价甚高，他认为自古希腊至康德的二千余年间，世界哲学进步甚微。其间尽管也出现了不少哲学家，但是“群言淆乱”，虽不泛“小知”，而终不免“大疑”^②。然而“迨汗德之说出，欧洲国民之思想与行动皆为之一变”^③，因为康德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不同凡响的创见。

康德认为，人类的知识虽然不能超越经验，然而有一部分知识却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得出，而是来自先天的。例如时间、空间、因果等，就是先验存在的范畴，因为人类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运用“因果”等一系列范畴进行思维，从而认识事物，而时空、因果等既不是事物本身，也不是事物的属性，仅仅是人类用于认识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被人类认识的事物已经不是“物自体”的本来面目

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遗书》第五册。

②《汗德像赞》，见《遗书》第五册。 ③《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遗书》第五册。

了，人类认识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本质——“物自体”乃是不可知的。

康德称自己的哲学为“先验的唯心主义”，王国维认为它是“旷古之绝识”，在《汗德像赞》中，他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要义：“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灿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并且以美好的比喻给康德以极高的评价和赞扬：“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暗。谷可如陵，山可为数；万岁千秋，公名不朽。”

然而，王国维对康德的认识论并非全盘认可，只是有所不满。他的不满就在于那个“物自体”的“不可知”，他称之为“怀疑论”^①。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叔本华给了王氏一个满意的回答。

叔本华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反理性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开始的。康德的认识论，他只接受了前半部分，即时空、因果只是认识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所认识的世界只是现象（叔氏称之为“表象”）。至于世界的本质，那就是——“意志”。（关于“表象”和“意志”，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人间词话的理论和批评》中进行阐述，此处从略。）

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遗书》第五册。

王国维对叔氏的这一建树深为敬佩，他说：

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学上之进步几何？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误谬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而已矣。而汗德之学说仅破坏的而非建设的，彼憬然于形而上学之不可能，而以知识论易形而上学，故其说仅可谓之哲学之批评，未可谓之真正之哲学也。叔氏始由汗德之知识论出，而建设形而上学，复与美学、伦理学以完全之系统。然则视叔氏为汗德之后继者，宁视汗德为叔氏之前驱者为妥也。^①

在哲学思想上，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影响极深，他几乎全盘接受了叔氏的理论体系。除了上述认识论之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叔氏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它表现在人身上就是无穷无尽的欲望。欲望无穷而满足有限，所以人生充满了痛苦。对于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是有亲身体验的，他四岁丧母，三十岁丧父，三十一岁丧妻，五十岁又丧子，可以说一生都处在不幸之中。他又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常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的眼中，人世间处处充满了苦难。因此他既“忧生”，又“忧世”，终其一生都处在忧虑之

^①《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遗书》第五册。

中。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具有超群禀赋的天才，而“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因为“蚩蚩之民，饥而食、渴而饮”，“虽有大疑一患不足以撓其心”，“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①，因此，除了生活的痛苦之外，天才还要受“大疑大患”的折磨，王国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根据叔氏的理论，天才的“意志”（也就是欲望）也远远超出常人，因而他的不满足就更多，其痛苦也更深。所以“天才之大小与其知力意志之大小为比例，故痛苦之大小亦与天才之大小为比例”^②。

凡此种种，都为王国维深切的人生体验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他对之笃信不疑。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并不是从读叔本华开始的，然而叔本华的理论使得他的悲观思想更加顽固，他说自己是个“永抱悲观者”^③。

二是博爱主义的伦理观。

叔氏认为，“表象”是多种多样的，而“意志”只

①②《叔本华与尼采》，见《遗书》第五册。
全集·书信。

③见《王国维

有一个，从无机物到植物、动物以至于人，都是这同一个“意志”的“客体化”。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一切类别都是不存在的，世界万物都是同类，彼此之间应该是相互爱悦的关系。人类社会之所以充满了罪恶，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其根源就在于一个“欲”字，受“生活之欲”的驱使，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竞争乃至敌对的关系，“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①——这是人类最惨的悲剧。认识到这一悲剧的残酷性，“知己所弗欲者人亦弗欲之，各主张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②，便是“正义”；“更进而以他人之快乐为己之快乐，他人之苦痛为己之苦痛”^③，便是“博爱”。而“博爱”之实现，则在于“绝欲”。

一个人如果灭绝了自己的“生活之欲”，他与别人的竞争关系就不存在了，这时候，过去的敌人也就变成了朋友，既往的仇恨也便化作了友爱。对这个没有欲望的人来说，整个世界“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④，他本人也从无休止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无比安宁快乐的境界。对这种“解脱”，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有一段绝妙的描写：

①《红楼梦评论》，见《遗书》第五册。 ②③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遗书》第五册。 ④《红楼梦评论》，见《遗书》第五册。